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

张 静

“现代化”由谁以及在何时提出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它的内容与人类对社会变迁的认识有关。一位社会学家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注意到了社会变迁出现了不同于十九世纪的现象：

世界目前流行一种一致的倾向，这种倾向代表了一种趋势，它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在信念和态度方面的许多差异都被一扫而光。尽管还存在政治障碍和国际紧张，但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产物仍在迅速发展，这种强力给不同的政府规定了相近的目标（却没有提供必要的相互友谊），这种一致倾向反映了人们把促进物质福利，改善生活条件作为公共政策和私人努力的目标。这在世界意识形态历史上是唯一的也是最成功的转变运动……。^①

这一社会现象后来被学者们命名为“现代化”，当然，此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正发生着的这一切性质怎样及结果如何。但是很明显，这个概念所代表的内容与之在历史学中的相同提法相比，已经广泛了许多。据C·E·布莱克(C·E·Black)教授的研究，历史学更早地使用了“现代”一词，一方面，它被用来作为一种略带嘲讽的“暗喻”——比如称法国革命党人为“现代人”，另一方面又被用作历史分期——比如指1500年以来的历史为“现代”史。^②在此意义上，“现代”首先是表述一种时限差别、其次才是表述性质差别的术语。但是在其他学科的使用中，它们的地位顺序被翻转了过来。也就是说，它首先代表一种社会性质的不同以示与传统社会的差别，但这并不等于承认1500年之后的所有社会都进入了“现代”，在时限上同属现代的社会可能在性质上是非现代的。这些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性质”，社会学家称为“现代性”。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现代社会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现代性”？“现代性”中有没有一个是根本性的可以确定为步入现代化的标志？不同国家的“现代性”应是相同的还是可以不同？产生“现代性”的条件是什么？或者是说，哪些因素有可能促进或是阻碍“现代性”的发育？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出现了一个影响颇广的学术研究领域：现代化理论，其成果已经流传到全世界并对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实际影响。但是直到今天，在这个领域中提出新问题的速度远远高于获得结论的速度，人们发现，越是研究“现代性”，就越是难以明确界定“现代化”，这也许是让现代化难以获得公认定义的原因之一。

① 参见W·E·穆尔《世界现代化——趋同的范围和限度》（英文版）第二章。

② 参见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中译本）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一、现代化概念的定义角度

“现代化”一词启用的初衷，是说明近代以来“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有人干脆称它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特例”。^①其特殊之处，在于它的速度、广度、深度和动力成份都较之以前大大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全面增长。世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几乎人类所有方面的快速成长都是在近代才开始的。由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这些发展都首先发生于西方社会，而后传播到世界其它地区，更由于这些西方的早发展国家之“景象”早期是通过殖民地或强国的扩张“带”到不发达地区的，所以各个不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含义大有不同。对于殖民地社会，它意味着“宗主国化”；对于强国的扩张地区，它意味着“强国化”；而当谈到世界其它地区时，这个术语意味着“西方化”，不发达社会靠着这一过程来获得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

二次战后数年的发展现实向现代化的上述含义发出了挑战，一些非西方社会迅速崛起，快速步入现代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非西方社会出现的现代化“飞地”使人们注意到了上述含义的狭隘，它使现代化意义的拓宽成为必然：人们不再用它来仅指西方，而是将在所有现代化社会观察到的共同成就——无论是西方（如欧洲和北美）还是非西方（如日本和亚洲“几小龙”地区），以及正在现代化中的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期望——都包括在其中。其核心成份是经济成长，因为它被认为是决定其它因素变化的基础，并可以测出明确的可比的量化指标。

但是，很快地，人们意识到以经济为先导的现代化必然造成一系列更深层次的社会转变：比如，随着工业产品的增加，一系列相应的公用事业、政府管理机构、教育部门等比重也在增加，这就带来劳动力就业结构、职业类型和地理分布的变化，大部分就业机会向城市集中，人口向城市迁移，都市社区大量出现，经济上的分工和相互依赖瓦解了地区性的封闭性，并使之向国家层次集中（即社会学所说的“大众动员”），政治权力也从地方方向国家转移。这个时候，人们都必须理解和接受新的行动规则，这又导致了以往的社会价值、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型、旧的社会结构以及依附于它的社会身份开始退落，新社会角色出现且功能特定，……诸如此类的种种后果都是现代化的伴生现象，它们对社会转型的震撼并不亚于经济成长的作用。从此，系统性或整体性的含义进入了现代化概念，人们说到这个术语的时候，一定同时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各个方面的变化，恰如一位学者所言，它是一付传统社会的“全面溶解剂”。

在上述几经变化的过程中，现代化这个概念不断补充新成份，使其含义的界定总是赶不上意义的拓宽，加之这个术语的“跨学科”性，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用它作为重要的分析手段，各学科的知识性质和学术训练又不尽一致，结果是，“现代化”在为这些学科使用时，只是在较宏观抽象的层次上（如社会变迁、转型）含义比较一致，而在较微观具体的层次上所指内容千差万别。经济学用它来指一个社会GNP的水平及其持续增长的能力；政治学用它来指现代民主政治；社会学用它来指社会结构的分化，……实际上，我们今天获得的有关这个术语的所有观念，正是这些不同学科所用含义的混合物。也许是因为如此，人们对现代化所下定义角度很多，它们大体上反映了不同学科对这一术语的认识：

起源的角度——现代化是由西方工业化所引起，而后又在其它地区兴起工业化的事件。

^① 参见蔡文辉《社会变迁》第六章，台湾三民书局印行，1983年。

因而它也是一种世界性的传播现象 (David E. Apter), 是一个较先进的社会对较落后社会的冲击而产生的种种变迁过程 (F. W. Riggs), 它是由国际间或社会之间的交流触发的 (Daniel Lerner)。这类定义实际上说明了现代化的两种来源: 在早发社会, 它是由工业化引发的“内生”事件 (工业化的“结果”); 在晚发社会, 是由传播引起的“外发”事件 (工业化的“条件”?)。在这两种情况下, 现代化的转发因素有的来自社会内部, 有的来自社会外部。

性质的角度——现代化是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支配的增长 (B. I. Schwartz), 是社会各层面的理性的增长, 如社会结构的分化、集中、生活方式的都市化, 价值取向的世俗化, 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等等。现代化意味着这些新特质在社会中出现并迅速扩散, 以致体制化地得到延续。现代化便是社会实现这些新特质的过程。这种定义特别注重现代化代表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结构, 强调人类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非理性无序状态中走向一个理性的有序社会。

指标 (量) 的角度——不少人认为现代化的定义应当有确切的标准, 它们可以是经济持续的自我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 (Rostow), 或是非生物的动力源泉取代生物动力源泉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 (m. Levy)。更具体的, 还可以指出人均GNP水平、识字率、都市化程度、非农业人口数量, 以及人均拥有的报刊、医生数量等等指标。这类定义由于回避了麻烦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性质等等问题, 以纯量化的标准衡量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有的国家可能这方面强些, 那方面弱些, 因而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现代化的强项), 把问题减化得一目了然, 使许多国家都能接受。但是这类指标常常主要是反映经济现代化状况, (有与“工业化”雷同之嫌), 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生活质量。

历史进程的角度——这类说法关心对过程的描述, 而不是它的定义, 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 任何确定质的企图都不能获得圆满成功。因为它是一个过程, 是一种连续, 是当代世界正持续着的一种变化, 从全球的意义来说, 这一变化还未完成。所以, 满意的解释恐怕还有待于后世。目前能够看清的是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意义: 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C. E. Black)。

这些研究传达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 “现代化”缺少一种人们希望的明确性。这是有理由的。多数发达社会的现代化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现代化后来者, 据此定出的现代化计划却常常难以奏效, 而且还严重地改变了现代化自然发展的原本方向。因此, 这些地区的社会变迁还是一种目前难以预期的事件。这种原本就不清楚的事实何以要社会科学家作出明确判断? 但是, 已有的研究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下列信息: 首先, “现代化”是对一种世界性社会现象的理论概括, 这一现象与工业化相伴生, 以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快速度传遍全世界, 所到之处传统社会开始解体, 原有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规则等等纷纷重构。因而现代化无法是某个民族自己的事件, 而是地域性国际分工条件 (制约) 所允许的可能机会。某一民族汇入这一世界性进程的现象就可以被称作是民族 (或国家) 现代化。第二, 一旦进入这个过程,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很自然地就将力图尽快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这将意味着, 它们虽然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现代化方式, 但就发展内容来说, 世界各民族的共性必然随着现代化过程而增加。第三, 由于现代化本身具有动力性, 因而在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 它的作用是既创新又毁灭, 既解放又压迫, 既给人类带来益处又要他们付出代价。对于研究者来说, 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事实判断的中性概念。

二、现代化的常识认识及其问题

上面是从正面讨论现代化“是什么”，现在换一个角度，分析一下现代化“不是什么”。

许多同现代化有关，但又实际上不同的认识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常识认识。这些认识是非学术性的，但非常有可能影响到现代化的学术研究，人们往往把它们同“现代化”相混淆，并可能在这些常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思考现代化的全部主导观念。很明显，50年代以来，我们有关现代化观念的一部分，正是来自于这种基础。比如我们常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社会目标，给它加上理想化色彩，期望在社会各方面出现大变动之前先发展经济；我们期望只接受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同时又把人际关系和社会心态维持在50年代的纯朴水平；战后自然地把价值判断带进现代化概念，认为它会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先进和高尚，……所有这些认识原因在于我们对现代化没有超出常识水平。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必然是单向的。

让我们讨论几种常见的常识认识。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没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作支持的现代化肯定是空谈。当今所有公认的现代化国家（社会）在这两方面都是优秀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现代化与之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具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因为许多社会的历史事实已经在证明它们相互联系的同时，也证明了它们的差别：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现代化。

经济学家给工业化下的定义是取代生物性能源的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夺取统治地位的过程。他们使用经济增长来表示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实际数量的增加，更恰当地说，是表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量的增加。毫无疑问，巨大的经济增长是工业化之后的事情。因为机械能源比生物能源有更大的效率，效率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在20或30年前，很少有人怀疑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现在则不一样了。人们注意到即使在经济增长很快的情况下，不少社会仍然未取得普遍的社会经济进步，一方面，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一定能阻止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同时，增长所带来的利益也不一定能自然达到公正分配。有一本讨论非洲国家现代化的名著《没有发展的增长》为上述观察提供了大量实证。有些非洲国家生产了越来越多的产品，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其产品也销售到海外市场。但是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几乎完全被特权阶层和小部分中产阶级占有，而大多数民众仍未摆脱贫困。这就是说，这些地区反映在统计数表中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提高很快，但是人均医生拥有量、人均耐用消费品和通讯服务的消费量、人均蛋白质消费量、识字率、住房、就业以及更高级的参与政府决策和个人自由等等却维持在原来的水平。

因此，现代化不完全是经济学问题。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平等有许多都不是单纯依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所能解决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领域同样与满足人的需要息息相关。这些方面的低质量生活，同样是一种“贫困”。因此，就满足人们的需求，提高生活水平来说，经济增长只代表了现代化的一个部分。而现代化特别注意的是经济增长带动的社会其它部分变革，即经济增长的社会结果。比如，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而制造业、公用事业、财政机构、建筑、教育、管理机构的比重相应增加，劳动力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自然要求教育和培训水平的提高，而且职业类型的变化影响了它的地理分布，使大部分新的机构（就业机会）集中于城市，于是兴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向城市迁移，产生新的职业集团和社会阶层。传统的以村社为中心自给自足的社会失去了它在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权力中心开始从地方向国家转移，人们需

要建立新规范以维持新生活的秩序，……这是一场从上到下，从外部到人的内心的深刻动荡。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否能包含如此众多的容量呢？

如果考虑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或物质基础，因而将二者看成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似乎有一些道理。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它们往往是同步发展的。但这种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它恐怕只适用于内生的现代化类型。外发的现代化可能在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未出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并不是民族现代化的最初动力，现代化也不是工业化的结果，相反倒是兴起民族工业化的条件（虽然最终它们必定是相互促长的）。在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中，这种“因果顺序”排列的不同尤应引起注意。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往往是在外力作用下由外部引入的，这必然形成对新意识形态、新观念的共识，结果是破坏了传统价值观念、规范和文化精神，刺激形成了改变现状的情绪，从而生成一场运动使政治体制转型，产生现代化领导集团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这一过程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与工业化无关，但至少说明了区分它们的重要性，否则人们可能把现代化简单地（或首先）看成是一种经济增长（此观念极普遍地反映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中），这样短视恐怕与上述误解有极大的相关。

近代化。由于现代化是随着近代历史帷幕的展开而出现的事件，因此在许多语言里，它与近代化常指同一内容（比如日语）。实际上，这两个术语是否能通用取决于你对近代化的看法，这是一个始终存在争议的概念。

一种说法是从文化史角度出发的，这种观点认为不同于中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的出现是近代化的开始，其标志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或地理大发现，这些活动的代表人物——米开朗洛维奇、马丁·路德、哥伦布是一种新人类精神的象征，它使人类走出了漫长的中世纪，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近代。

更多的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近代化开端。然而资本主义从何时开始又有不同看法，有人强调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有人侧重产业革命。这些说法都比第一种意见认为近代开始的更晚。但是，没有自然经历资本主义的社会难道一直没有进入“近代”吗？这样来理解问题看起来排除了“近代化”一词中所含的时间意义。

第三种看法指出市民革命运动是近代化的开端：英国新教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等，在这些市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是一种局限于某部分人的集团民主，距离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还有相当遥远的路。大众社会意味着大众教育普及、生成大众文化、大众消费水准的普遍提高以及普遍选举权的实现。而大众社会的形成正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西方是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是在60年代初进入大众社会时代，如此说来，“市民革命”只是开创了大众社会出现的可能性。但这种说法比其它几种距现代化都更近，因为它包含的内容比上述两观念的意义更广泛、更复杂。

但是，无论用哪种意义来理解近代化，都有两个难题无法解决：第一，有的社会在近代化开端之后出现的历史事件在另一些社会却出现在近代化开始之前；第二，不少已经开始近代化的社会却迟迟无法现代化。这两个难题表明，作为近代化开始的标记尚需推敲，而且如何巩固近代化之成果——推进其体制化^①恐怕也是近代化这个概念还无法包含的。因此，“近

① “体制化”的含义很多，所以需要界定。借用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说法，所谓体制仅有如下含义：一、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因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二、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的行为规范，其管理方式适用于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于其它活动的自主性；三、其它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之（《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147页）。有了这样的条件，一种社会活动便有了自我生长、维持和扩大的保证。对于“现代化”同样是如此。

代化”这个术语历史分期的印迹较浓，有“时间概念”之嫌，诸如“现代史”，“现代思想（经济）史”，或“现代小说”，以及“现代音响”、“现代家俱”等等，虽谓之以“现代”作定语，而实际指的是“在时间上较近”之内涵，而“现代化”关注的重点是变革的性质而不是年代。是故，即使上述的争议不复存在，在用“近代化”取代“现代化”概念时，也需特别小心。

进步。这是极不容易和现代化相区分的观念，因为它涉及到价值判断。人们通常用“进步”指社会朝向人们满意的方面发展，比如，人们认为机械操作比手工操作更好，于是就把由手工向机械化的转变看成是“进步”的；人们希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类的各种渴求，当然就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社会“进步”。既然不能阻止人类把美好的理想付诸于现代化设计，我们就无法否认现代化应当有进步性。

但是，这种看法容易给现代化蒙上理想主义的面纱，从而让人们忽略它的复杂性，或者是将它给人类带来的不幸一面归结为设计或方式上的毛病（或暂时的代价），不去注意现代化本身对人类幸福影响的多面性。近一、二十年来，这些“多面性”已经日益明显，它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曾被我们当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失误”来批评，而现在，不少公正的社会科学家已经敏感到凡是追求现代化的社会都或近或早、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同一类问题。

这些问题是：

资源枯竭——人类消费资源的曲线总是同现代化发展的曲线形影相随的，众所周知，越是现代化的地区，各种资源的消耗总量越大。有人做过一个粗略估算：自人类出现以来，地球上大约生存过700亿人，那么现在的50亿人大约是人类史上总人口的7%，假设现代人的寿命是他们祖先的一倍，则目前地球人口在一生（一代）中的消费量超过了所有前人在一万个世纪内的总量；世界每年森林消失的平均面积等于比利时、丹麦和荷兰三国的总和；北美和西欧这两个“发展大户”就占去了世界矿物能源总进口量的2/3、金属矿产的3/4、有色金属矿产的4/5；1975年，美国的人均耗煤量是亚洲社会的20倍左右。美国社会每生产长一路里食物，从包装、空调到冷藏和运输，各个环节消费掉的能源是惊人的，这些工序如果以同样的质量普及到各个国家，其所需要的能源消耗全世界都难以负担。^①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正在高速破坏着明天幸福的条件，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犯罪——一位叫刘易斯·伍德（Lewis Wood）的作者观察到，斯里兰卡在50年代受到西方现代化影响最大，同时又是杀人犯罪上升最快的时期，他指出在中国和非洲，犯罪率也是随着现代化发展而上升。传统规范和价值的解体导致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混乱和病态的增多，暴力、犯罪、自杀等等大量涌现，一些估计表明，从1820年到1949年，战争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并已付出无数生命的代价，丧生于小规模群体暴力的人数和涉及1—3人以上的凶杀案件越来越多，这个数字远超出了传统社会的情况。文明社会在侵入传统社会时究竟为何要夹带着犯罪，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有人将其归结为政治领袖的恣意妄为或是激进的变革对人性的巨大震荡造成的，竞争的失败和人际关系的解体削弱了信念、责任和义务，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刺激了人类本性中的贪婪、扩张和霸权野心，各种非人道的行为层出不穷。

孤独、焦虑和非人格化——由于成千上万的人从土生土长的村舍共同体迁移到新社区，亲密无间的人际环境消失了，维系情感的纽带松弛了，不信任的增加带来了防备和敌意，人

^① 这方面资料参见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以及罗马俱乐部的《未来一百页》、《增长的极限》等报告。

们的责任分散、遵从性降低，更加自由，但目的更不专一，情感更缺少归宿。社会成员失去了共存感和归属感，这种分裂使得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成为现代社会的心理病，紧张和防犯笼罩着所有人的心理，并极大地损害着人类的健康。有一份研究指出，由传统固体到现代社区的土耳其儿童中有较高的机能混乱和心理阻碍现象，精神病患者极多。^①都市生活的冷漠、形式主义等等非人格化生活方式不断地异化着人类自己，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没有随现代化而到来。

还可以举出过份都市化问题、老龄问题、离婚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不希望的。但是它们却不顾人类的好恶追随着我们，让我们在现代化中有获得也有丧失。既然人类目前还不能把这些现象同现代化过程完全分开，既然我们还没有为“进步”重新命名（让它加上一人类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就有理由强调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中性的事实判断，虽然它并非与价值判断无关，但区分它们，避免用一个代替另一个是绝对必要的。

西方化。现代化术语在出现的早期与西方化大体上同义。这不仅由于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出现，更由于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多数是在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传播才兴起的。进入近代以来，世界发生的任何事件也没有下面这个事实对各民族影响更巨大：一种世界性格局的兴起结束了民族发展的相互隔离的多中心时代，世界的整体化使得全球各民族的发展不自觉地纳入到一种相互影响的状态中，这在逻辑上形成了发展时间、内容和水平的可比序列，人们热衷于向更好的前景迈进，而这些前景只能从“西方”学来，“西化”正是以这样的前提作基础。很自然地，早期的工业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成为其它国家的“样本”，它们的今天便是后来者的明天，南亚的“英国化”、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化”，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扩张形成的各大洲局部地区的“美国化”，都在总趋向上用一个包容量更大的词汇“西方化”所概括了，这的确是一个高度浓缩而又有代表性的类比。

这个术语无疑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民族力量对比，影响的主要流向及民族间交流方式上的基本特征：风从西方来。但是，随着上述这些因素的变化，社会间新的交流、影响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对西方化的重新命名，人们不再想以西方作为评价自己的根据，西方化越来越使人感到有狭隘和鼓吹种族中心主义之嫌。

“西方化”在政治上引起的后果十分强烈，以致于使这个术语的政治意义超出了它的学术意义：人们怀疑它试图把西方之外的人引入西方人的视野；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看作是欧洲或北美的延伸；认定他们的经验对任何地区都行之有效——所有这些观念都招来了新兴国家对这个术语的政治反感，他们大多拒绝把自己国家干的事情说成是“西化”。但他们可以接受“现代化”的提法，因为它字面上看去无碍于各种意识形态的局限，能适应非西方国家抵抗西方种族主义的心理需要，满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特别是一些选择了非西方道路的国家，更认为理想的文化并非是简单地规定往“西”走，而是走向一种多元性的文化整合状态。对此，用“现代化”比“西化”更为合理，它意味着世界化，而非世界的某一部分化。的确，“西化”和“欧化”在描述近代较先进国家对较落后的国家影响时，只说明了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尽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它不仅不能说明先进国家本身当初转变的过程，甚至也不能说明曾经落后的国家对仍然落后的国家的影响，“我们不能把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转变过程称作“西化”，也不能把20世纪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影响说成是“欧化”，（C·

^① 参见R·莱纳(R.Lancier)《社会变迁省察》(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英文版。

E·Black),以全球参照系观之,这个术语确实是太狭窄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化事实本身的发展比人们认识它的速度要快得多,一度曾被广泛接受观念,在今天看来都已不严格,它们已无力于表述这个过程的全部复杂性,阻碍了人们以创新的精神去理解现代化。可以肯定,这种挑战还会不断发生,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随时从事实,而不是从旧有的观念出发去认识现代化。

三、现代化与现代性

在上一辈研究者那里,“现代性”被用于描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最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现代化”则是这些国家获得这些特征的过程。但是,究竟先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什么,没有单一的理论模式能统一科学家的见解。随着现代化与社会计划的结合,人们需要确定达到目标的手段。而哪些目标是必须的,又取决于对现代性的认识。这个过程多少有利于人们对现代性产生一定的一致性认识。比如一些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逐渐被看作等同于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还比如许多综合性的发展指标都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相同领域;甚至有些指标是不同研究者共有的(也有一些指标看起来很相似,明显的相似性有时掩盖着重大的差异)。下面将要讨论的一些现代性突出特征,就是多数学者以不同方式提到的,当然,我们不能不忽略一些他们在提法上的不同点。

(一) 经济以稳定数率持续增长

经济逐年持续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新近的事情,它仅出现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时期。在此之前,曾有过长期的经济波动,其中包括1600年到1700年之间西欧的几次低潮时期,但是1800年之后,人均产值开始稳定地增长。持续增长的过程始于英国,而后是美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各国在不同时期登上了经济增长的“楼梯”,它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向上运动。但是也和楼梯上的人一样,有的走的快,有的走的慢,有的上升,有的下降,有些国家在增长了一定时间后就停滞了,有的国家则在楼梯上达到了“持续增长”的条件,还有一些国家看起来是在持续增长,但由于其速度赶不上人口及其消费的增长,因而相对来说,这是一种“负增长”。

影响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它们,因为我们承认的是这种现实,不是在讨论原因。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2500美元的社会(被人们称为发达社会或现代化社会)中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6~1/4用于重新投资,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在传统社会(人均产值200美元以下)仅有1/20或更少比例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再投资,加上制造业占总产量的比例低(10%以下),以及识字率低(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和知识促进经济增长),这三方面被称为贫困的三个标志,^①同时也是非现代化国家共有的经济标志,它是划分“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根据。今天,许多所谓“现代化社会的标准”其中多数往往是这些经济增长变项的翻版,尽管有相当多的专家怀疑这些指标反映问题的准确性,但经济增长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却是无人否定的。

^① 联合国大会1971年11月通过了这三条标准,同意由此来确定“最不发达国家”的定义,目前正式列入名单的有31个国家。参见《信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辑出版,1981年12月号,第8页。

（二）集中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集中”的对立面是分散、隔绝、相互无关；而现代社会就个人活动的制度结构而言是整体化的，即相互沟通、相互依赖的。达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因为非专门化的社会不产生相互依赖的需要），二是有大体上统一的规范来约束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否则不同地区，有不同传统的人相互交往便不可能），在现代社会，这种“统一规范”的最典型形式是法律。

“公民社会”是指一种平民主义社会，在其组成的基础中，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人们对于特殊群体和领袖（其合法性来自神授、先赋性或传统）的政治效忠明显削弱，而以整个国家为尽义务的中心，权力通过各种曲折的转化形式落入成年公民手中，每一个公民很有可能通过参与和必要的程序在选择政策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任何人或利益集团都无法在获得法定的支持之前，将自己的主意变成法律。其结果是公民权力、公民自由、公民文化和福利、公民教育等等方面的社会性程度扩大。这也是形成一种新型文化观——强调个性、讲求效率、关心改良的社会基础，它有利于“普遍主义”与“成就”两个标准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降低权势在身份关系中的地位。这也许是现代化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

（三）文化中世俗理性规范的扩散

这一特征同理性主义密切相关。给理性主义下定义很困难，我们可以把它广义地理解为一种文化模式，它对影响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有重要作用。它至少包含着下列要点：（1）明确地意识到目的——行动者把追求的具体目标视作某种特定的价值，并根据价值的大小对各种不同目的的重要性作一番比较；（2）计算并预测后果来权衡行动的必要性——考虑目的对伴随的可能结果的关系，对结果负责；（3）针对目的而选择手段，或是对各种能达目的的手段作出比较和筛选；（4）要求在信念与行动中表现出严格的首尾一贯性。更具体地说，一个具有理性主义素养的行动者在行动之前都要思考如下问题：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达到这个目的？

——达到此目的的手段（途径）有哪些？哪一种效率最高而成本最低（对我更方便、更有利）？

——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

……

近代欧洲社会生活进步的本质特征是以合理性为行动取向，甚至有人断言说，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产生出合理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① 理性主义与科学的姻缘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思维的理性化就意味着排除巫术、情感、神（上帝）以及各种先知、真人经典的支配与控制，取消神秘主义信仰，承认现世与现时，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相信任何传统习俗和典章都可以在事实面前改变；而制度的理性化就意味着以最有效

^①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率的组织形式达到人类的共同目的。

当理性化作为普遍接受的规范而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就会在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形成一系列常规化的行为方式，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

（四）成就动机的心理类型

任何发展都需要人的感情投入，这是一种现代化转型的心理机制，它促使每个人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处境之中，与不同于自己原来的角色、时间、空间产生认同，并设法改变不良的处境。心理学家认为，在那些所有能够提供创造力的心理机制中，感情投入能直接地提供“向上动机”，它可以产生出人们对更好环境的需求与追求。这一机制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先天固有的，它可以通过有效的操作获得训练，使人们产生比以前更高的期望。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印刷品、电影、收音机等大众传播工具都在提供这类训练，它们发动了一场心理动员。

这种心理机制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是各种新需求的源泉，贫穷社会的人希望追求更好的福利，未受教育的人希望上学，普通人希望成为社会名流，……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不安于现状。这是传统社会中极少见到的东西，它们导致了一种有关自己的新观念，它促使个人产生一种责任感和参与动机。过去视为正当的，如今再也无法接受；在人们改变现实的努力中，解决的办法一定能找到，由此，把社会管理也推向了一个新层次。

（五）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城市化作为一种现代特质已经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因为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畸形、过度的城市化带来了人口密度、能源供应、交通、教育卫生设施等等方面的紧张。但即便是如此，也还不足以否定城市在现代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那些已经和正在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民族，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城市人口递增的趋势，因此，城市人口往往是一种常用的衡量现代社会的指标。

在西方，城市曾经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反过来，工业革命又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1801年时，英国与爱尔兰的城市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26%，50年之后（1851年）就上升为45%，19世纪末达到68%。进入本世纪后，1920年到1970年的50年内，欧洲人口增加了42%（3.25—4.62亿），而城市人口周期内增加了182%（1.04—2.93亿）。美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些数字同不发达地区和后发达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适呈对照：东亚1970年城市人口为30%，南亚为20%，非洲为22%，拉美为56%，而工业化的日本此时则达72%。^①

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不是更符合人类的本性需要还难以定论，但是如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现代化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经济方面，城市中劳动分工的形成与发展，服从于城市市场的扩大。城市的贸易中心地位形成后，自然会通过便利的交通，把外部经济活动大量吸引到城市来，加之人口的相对集中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这个市场能为工业家及商人提供一个十分广阔的经济活动范围，使城市经济密度（系指可居住面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产值和能源耗量）空前增大，与乡村形成巨大反差。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在政治方面，城市的社会协作、交往、交流以及人们的利益关系都为新型

^① 陈一筠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译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的控制提供了可能。它促使各种社会管理制度化。它重新凝聚、整理和组合了人们的活动，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履行各种职能的行政机构。城市正是凭借这些核心建制，而不是以城墙、广场和集市为其本质特征的。在文化方面，城市具有汇集、创新、传递文化的功能。城市在吸引各种人群的过程中，把许多民族和不同时代的学术、音乐、舞蹈、礼仪、传说、技艺等等移植、提高、保存了下来，否则会失传。一个十万人的城市，其积累文化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电子计算机，而且，只有在城市中，知识和大众传播系统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上述五条肯定是不全面的。事实上，现代性并不是可以用一套观念和体制来严格定义的概念，许多学者常常在界定它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学科意识，不自觉地在本学科中的最好理想（或期望）说成是“现代性”，遂使这个词难免不带有过份理想化的色彩。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谈的现代性多是具有“动力性”的社会特征，即它可能诱发引出一连串对现代化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看成是“向着建立现代性并使之体制化的方向转化的过程”（满宁·纳西定义），^①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近似循环的结论：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是互为因果的。由于它们不是一套体系性的组合，所以向某一因素对不同国家的重要性可能不同，因而它们的实际作用也会有较大变化。比如在西方社会历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增长三者之间曾经是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这同样的三个因素之间却出现了不协调，甚至相互阻碍的现象。我们现在还难以全面解释它们改变排列的原因。至于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互关系更是几十年争论的老话题了。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了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上，现有的认识是很初步的。至少，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1. 达到现代化所必要的因素（现代性）在什么条件下改变其原有的作用？2. 发展中国家是否有着一一些起着现代性作用（却没有被视为现代性）的“东西”？

四、现代化与传统

如果我们不是把“传统”仅仅理解为是那些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东西，而是把它广义地看作是社会在进入现代化之前的所有特质的话，就不会对下面的结论感到惊奇：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可能比它与现代性的关系更密切，因为它更多地同现代化的原因相关，而后者多与结果相关。

在那些影响现代化的重要变量中，传统的因素恐怕要排在第一位，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历史传统同现代化普遍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社会的所有体制几乎毫无例外地是由传统体制和现代体制混合后创生的新东西，既不完全与人们对现代体制的理想设计相同，也已经大大相异于传统体制。对于这一点，可以出具的一个“证明”是，目前存在于发达国家的许多现代特质都能从它们的传统中找到。在西方的传统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下列与现代化有关的明显遗产：

文化方面，基督教显然是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在基督教义中，其理性化倾向及希腊思想中认知的普遍主义，是与犹太教义中的超越主义、以及以行动为取向的伦理普遍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集中在罗马法里，其中融合了希腊的唯理智论与罗马的实用主义，因此，它的三个主要基调是超越主义、普遍理性和实用主义。前者在牵动社会变迁中起

^① 参见Z·克拉伦斯（Z. Clarence）《经济发展学导论》中文版第24页。

了中心杠杆的作用。后者提供了普遍化的基础，是中世纪特殊主义的强劲抗力。

在制度方面，一个重要遗产是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世俗的力量独立于国家，这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情形。另一个制度传统即都市或城帮网络，是罗马社会结构的产物。城市在整个中世纪以一定程度的独立存在，没有参与到乡村的封建权力结构中去，成了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的独立中心，因此，它的生存主要是依靠工商业和外部贸易。这些制度方面的传统极为重要（也许它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基督教伦理起作用的结构条件），它产生的结果是，各种结构上独立的因素可以相互牵制，从而防止了其中一个因素基于利害关系对现代化发展加以限制的情形出现。^①

我们已经注意到，没有一个现代化先发国家的历史可以完全被后发国家重复，这正是传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的地区现代化就意味着承认民间力量的权力，而有的地方却是国家有效地参与了经济事务同样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管变化有多大，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仍然保留下来并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有学者研究指出，传统体制完全改变其功能是极其罕见的，^②一些选择了集中模式的地区可能在历史上就存在着此种倾向的传统，同样，具有地方主义传统的地区可能会激烈地抵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集中，以致使双方的争夺、承认和妥协最后导致一种新式政体。此外，一个社会对付外来的挑战和内部危机（许多后发的现代化正起因于此）的手段（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深厚的社会传统，它可以决定现代化的方向、速度，还可以在感到不适应或不喜欢时对现代化的内容作出重大修正。各个社会在成就上的千差万别与其说是现代化领导政策不同，不如说是他们具有的传统遗产不同。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政策的成功和失败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无论制定还是执行政策都得承认它们的功效都依赖于传统的态度，起码，制定现代化目标与政策时应当认识到，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东西对现代化有深远意义。如果没有国王、贵族、平民之间关系的长期演变，我们很难想象英国的议会制，美国的宪法也深深根植于17、18世纪（当然有人坚持以为它业已落后于时代了）。苏联政治体系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独裁制度的传统，而这能追溯到莫斯科公国的诸位大公们集中权力的努力。日本精英领导的模式来自于传统的职务等级制度内部长期的相互关系。这些遗产都对这些社会最终采取什么形式的现代体制（选择哪些现代性）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越是扩大研究现代化的其它方面，就越是能体会到传统必定是不同民族现代化概念中的一部分。现代性是使它们趋于“同”的力量，传统是使它们趋于“异”的力量，现代化则是向着上述两因素发生的“张力”方向发展。开始于不同体制和不同基础的现代化必定同时受到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导引，通过传统的信仰和实践，现代化道路被规定，被给予意义，被给予合法性。传统帮助人们承担革新，并反过来受到这些革新的影响，遂使现代化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冲实与合作的结果。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李国庆

^① 参见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中文版第三章，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参见C·E·布菜克《现代化的动力》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